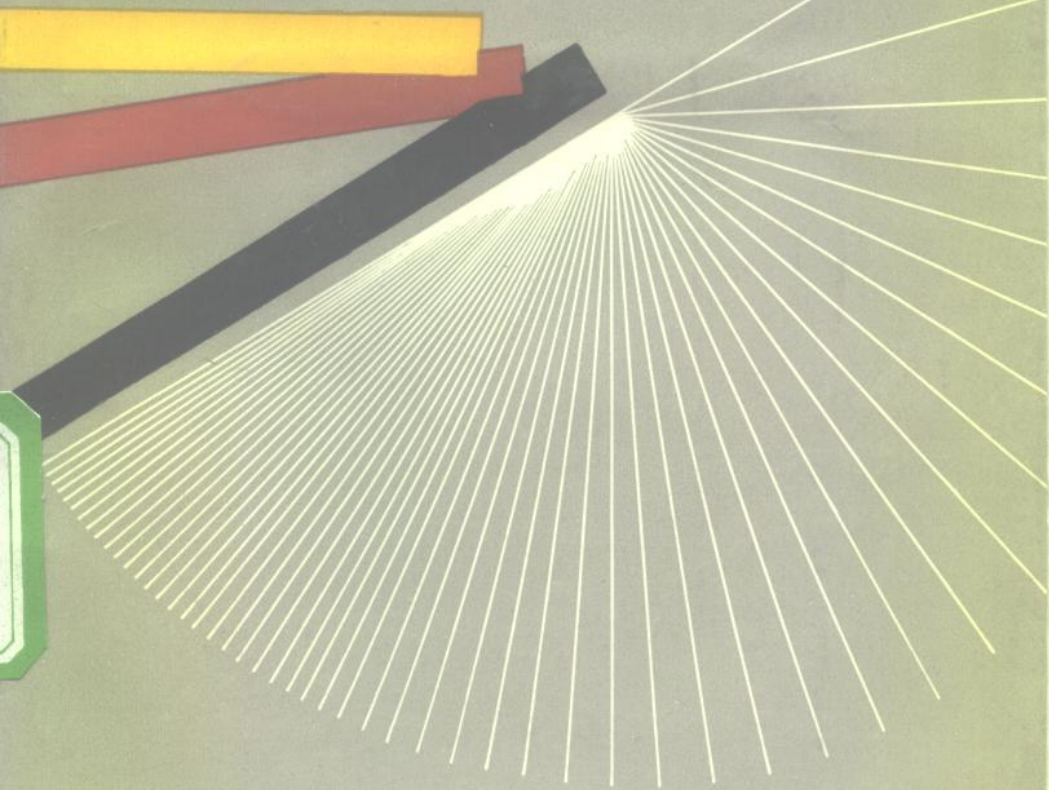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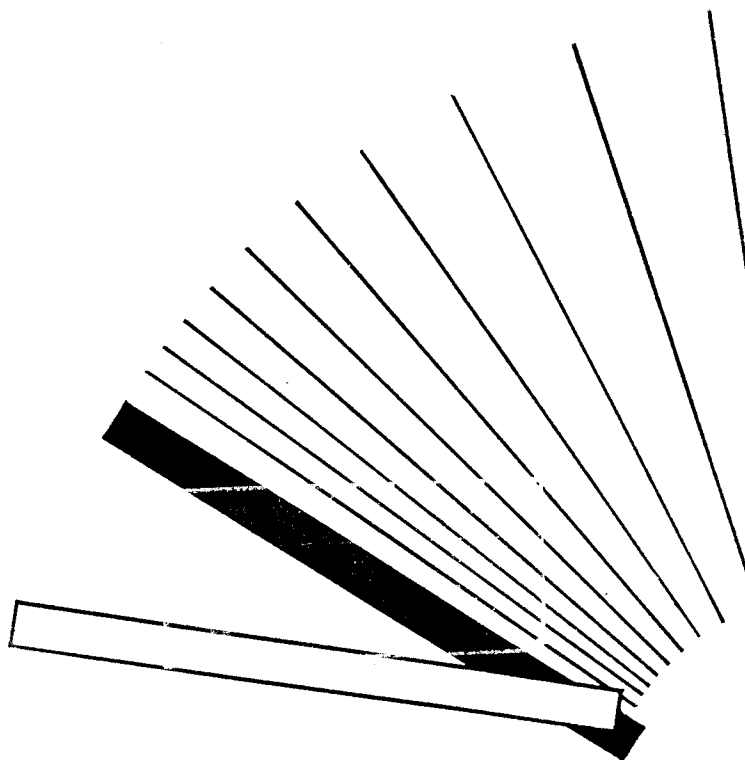


主编 ● 陈 昕

公有制经济运行的 理论分析

——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经济学论文选





公有制经济运行的 理论分析

——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经济学论文选

责任编辑 赵立新
封面设计 露水

公有制经济运行的理论分析

——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经济学论文选

陈昕 主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1991 年 8 月第 1 版
199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插页 2 字数：140,000
印数：1—3000

ISBN 7-5426-0499-6/F·105

定价：4.70元

DG76/14

前 言

陈 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学无论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方面，还是在理论创新方面，抑或在研究现实问题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一点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在基本范畴、分析技术、研究方法乃至语言方面仍然是非常传统的，与现代经济学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或者说根本就是两种经济学。翻开世界各国出版的经济学著作，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也不论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他们所使用的基本范畴、分析技术、研究方法都是基本相同的，那就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分析技术和研究方法，而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仍然停留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阶段。就研究方法而言，国外经济学一般都能根据一定的经济理论，假定一些前提，然后从现代经济学方法中选择一二种方法，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研究，而我们则除了思辨的、逻辑的方法外，很少有其他的方法。因此，今天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促进其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

上海三联书店从创立伊始，就把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作为其最根本的任务。三年多来，我们先后出版了数十种经济学著作。这些著作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尝试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分析技术、研究方法乃至语言来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尽管这些著作还远未成熟，但毕竟标志着中国经济学家在通向现代经济学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初的一步。

令人高兴的是，我社最近出版的樊纲主笔《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一书，无论在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方面，还是在建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体系方面，抑或在创新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概念、观点和范畴方面，都把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基于此，我社于1990年12月10日、11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研讨会”，专门针对《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的学术成果展开讨论。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和杭州的3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在公有制经济运行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展开了近年来少有的激烈的理论交锋，重要的是，这些理论交锋大都是建立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和方法基础上的。这本论文集就是这次会议的最终成果。

我们出版这本集子，并冠之以“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经济学论文选”的副标题，是为了向全国经济学界表明，上海三联书店将为促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进行长期的努力，并以此形成中国经济学的“三联学派”。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支持我们的追求，为我们提供高质量的标准经济学著作，进而为提高中国经济学的水平，使之立足于世界经济之林而共同奋斗。

目 录

前 言	陈 昕 (1)
宏观经济学的特殊问题与逻辑结构	
——兼论总供求缺口的形成与影响	樊 纲 (1)
论非市场协调机制下的高速增长和总量短缺	胡汝银 (22)
公有制经济中的非短缺性不足	周建明 (40)
公有制经济中积累率的经济分析	雍 同 (58)
低估折旧的长期分析	萧高励 (76)
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对外贸易与对外贸易	
管理政策的有效性	王新奎 (83)
公有制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探讨——关于固定工作	
时间下的劳动者行为的另一种解说	张 军 (100)
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陈 昕 (110)
配给制与灰市场	史晋川 夏海舟 (121)
公有制经济的性质	陈 郁 (140)
“计划者”的理论概念和对传统社会主义	
经济学的反思	张曙光 (157)
公有制经济运行机制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研讨会”综述	山 连 (175)

宏观经济学的特殊问题与逻辑结构

——兼论总供求缺口的形成与影响

樊 纲*

本文将对《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提出的两个论点——“总量缺口的需求决定论”和“总量缺口引起经济过热增长”——作一些进一步的理论分析。

在笔者看来,理论上的一些争论,症结点往往在于理论逻辑和概念体系方面的问题。比如,就现实中存在的经济弊端而论,似乎每个经济学家都承认,在我们的经济中,既有“国民收入超分配”、“货币供给失控”的问题(从而引起总需求膨胀),又有生产效率不足、资源配置不合理之类的问题(从而引起总供给水平低下,或称“总供给不足”)。但问题在于,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这些经济现象事实上分别属于哪个层次,处于哪一地位,在逻辑、概念体系中究竟具有怎样的相关关系,以一种怎样的方式相互联

*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系,如何从不同的侧面共同说明同一现象(总需求 $>$ 总供给 \rightarrow 总供求缺口)。因此,在笔者看来,要想弄清楚问题,就需要在逻辑体系问题上进一步下些功夫,努力将各种理论问题放到一个完整体系或总体分析框架中的适当位置上去,从理论上系统地把握各种问题的性质和相互关系,既避免“理论错位”,又避免循环论证,抓不到特殊问题的特殊规定性。出于这种考虑,本文将先用两小节的篇幅对公有制经济理论的逻辑结构作进一步的讨论,对理论体系内各部分的相互关系作一些集中的阐述,然后再在此大背景下对上述两个具体问题进行讨论。这样做,或许能使问题更加清楚,讨论更加深入,也有利于同行们进一步研究和批评。

一、微观问题与宏观问题

(一) 公有制经济的特殊性

现代经济学理论从30年代起逐步被划分为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而划分的一般标准是:微观部分研究“个体经济行为”与市场结构,宏观部分则研究“总量关系”(或“总体活动”)与政府调节政策。^①由于这一套理论首先是在西方私人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按照上述一般标准划分,既简便易行,又不容易引起误解。

但是,当我们试图把这理论结构及其划分标准应用于公有制经济分析的时候,就会发现问题不那么简单了。在公有制条件下,有许多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很难按照“个体”和“总量”(或“总体”)的标准划分;即使在多元主权机制下,公有制关系本身也决定着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要有某些“统一规定”。例如投资活动和资源配置,在私人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个体活动,而在公有制条件下,在很大范围内和很大程度上就属于计划者控制的总

体活动。企业生产行为似乎是一种“个体行为”，但若企业只是严格地按照上面制定的计划生产，统购统销，那么企业只是计划盘上的一个棋子，很难说它是一种个体行为，个人的消费行为似乎总是个体行为，但若统一规定工资标准，许多商品又有“定量”，消费者能买到什么不能买到什么首先由计划者在制定生产计划时决定，那么个人消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总体的性质。可见，用“个体”与“总体”这一一般标准，很难对公有制的经济活动进行划分。或许正因如此，有些分析家提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划分，对于公有制经济是不适用的。有人认为我们只能有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有人则认为我们只能有“政府经济学”（因为一切都是由“政府”决定的）。

另一方面，即使从经济学的一般发展趋势来看，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部分，现在越来越强调“社会福利含义”和政府干预的“宏观背景”；而宏观经济分析，则越来越注重宏观变量的“微观基础”，用个人选择行为和企业活动分析，来对各种宏观现象进行解释。总之，个体与总体之间的界限，在理论上正变得模糊起来而不是越来越清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还能够对公有制经济进行“宏观分析”或“微观分析”？这种区分是否还有理论和实际的意义呢？

（二）根据问题进行的划分

按照“个体—总体”的一般标准，自然很难对公有制经济理论进行划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已有的现代经济理论，就不难发现，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根本差别，并不在于个体与总体这种研究对象的差别，而在于所研究的问题的差别。

首先可以注意到的一个差别是，是“实物问题”，还是“货币问题”的差别。所谓“实物问题”（也可称“真实问题”），指的是经济过

程中由真实变量的变化引起的现象以及真实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所谓真实变量 (Real Variables), 指的就是生产要素、物质产品、相对价格(比价关系)、(由要素边际产出率决定的)实际利息率、实际工资以及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国民总支出、经济增长率等等。所谓“货币问题”(也称“名义量问题”), 指的则是一切与货币数量有关的名义变量的变化以及由货币数量变化引起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所谓“名义变量”, 指的是诸如名义国民总收入、名义利率、名义工资、价格总水平等经济变量。在货币经济中(只有在货币经济中才会发生实物问题与货币问题的区别), 货币数量以及名义变量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们的变动能够引起实物变量的变动, 比如说引起经济增长率和就业量的波动。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仍然)仅限于研究实物问题本身, 研究真实变量之间如何相互作用; 而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着重研究货币问题, 即研究名义变量变动的原因以及由名义变量变动所引起的真实变量的变化。例如, 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如何引起物价水平、名义收入等等的变化, 引起总需求的变化(总需求是以货币为支付能力的需要), 并因此而引起社会生产水平(真实变量)的变化。

不过, 按照这一标准划分, 有时还会出现例外, 因为有时不研究名义变量的理论, 也属于宏观理论。比如, 在凯恩斯宏观理论模型中, 假定货币量、价格水平、名义工资等都不变, 也能通过消费不足、投资不足或政府支出不够(这些都可视为真实变量)来说明失业这一现象。^②80年代出现的某些“新古典宏观模型”, 也仅以政府支出、技术变化、“外部震动”(如石油危机)来说明经济的“真实循环”。可见, 上述标准还缺乏足够的一般性; 它虽然可以用来说明微观经济学不研究什么, 但还不能说明宏观经济学所必需研究的特殊问题是什么。因此, 它还不是划分微观问题和宏

观问题的根本标准。

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最根本的差别在于：这两部分理论分别研究的是不同的效率问题，或者说，是经济效率问题的不同方面。

经济学可以说就是研究一定制度条件下稀缺资源利用效率的科学。在《大纲》中，我们区分了经济效率概念的三个方面的内容^③，即：1. 生产效率，也就是生产过程中的“节约”问题或“成本最小化”问题，其“对偶问题”便是如何用既有资源生产出最大产出的问题；2. 配置效率，即是否将有限资源合理分配于各种产品的生产，使消费者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效用)的问题；3. 动态效率，即经济如何在长期内充分而合理地利用资源，实现经济最大限度而又均衡稳定地增长的问题。其中动态效率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消费与积累的合理比例问题；另一方面是与总需求规模相联系的现有资源的利用程度问题(是利用不足、失业，还是过度利用?)。

在这三方面的效率问题中，属于微观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的，是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而属于宏观经济学“特征性问题”的，则是动态效率，特别是与总需求规模相关的现有资源的利用程度问题。可以回想一下，宏观经济学中的每个组成部分，包括消费需求理论、投资需求理论、政府行为理论、资本市场理论、就业理论等等，无不都是通过动态效率的分析，研究现有资源或现有社会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问题。(关于各种效率问题的具体差别，我们后面还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这样，总括起来，我们有了理论划分的三重标准：(1) 个体与总体；(2) 实物问题与货币问题；(3) 静态效率与动态效率(这里我们将生产效率与配置效率简单地概括为静态效率)。总体行为、货币问题、动态效率问题，总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个体行为与总体行为难以划分的场合(如公有制经济)，我们可以

根据货币问题和动态效率问题来区分宏观经济理论的特殊范围，在货币问题不明显或可以抽象掉的场合（比如在非货币经济条件下或者在研究长期问题的时候），我们则可以根据总体问题和动态效率问题来区分宏观经济理论的特殊范围。但无论如何，若仅研究总体问题和货币问题，最终却没有“落实”到动态效率问题上，仍不能说是宏观理论。稳定增长这一动态效率问题，总是宏观理论的最基本的特征性问题。

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的问题，严格地说仅属于微观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与总体行为相关（如在公有制条件下），或是与货币问题相关（比如《大纲》中分析的超额总需求和过热增长引起“结构恶化”），因而在宏观分析中也会有所涉及，但本质上说，对这两方面效率问题的分析，特别是对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分析，不属于宏观理论的范围，而仅属于微观理论的范围。在《大纲》中，因为考虑到有关公有制条件下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分析尚不充分，才设置了第三篇（共5章）作一背景性分析。但正如在《大纲》中已指出的那样，我们认为这5章的内容，严格地说应属于微观经济理论的范围。

据此，针对公有制经济的特殊情况，我们可以对公有制经济理论的划分作以下建议：公有制微观经济学主要包括对生产效率与配置效率有关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无论它们是由个体（个人、企业）行为决定的，还是由总体行为（政府决策或统一计划）决定的，也无论是否有货币因素在其中起作用。宏观经济学则包括与动态效率有关的各种问题的分析，无论这些问题是由个体行为引起的，还是由总体行为决定的，也无论是否有“名义变量”夹杂其间。我们当然可以尝试另创体系、另辟蹊径，但上述划分方法，一方面是考虑到了公有制经济的特殊问题，另一方面也是顾及到

了现代经济学通行的惯例，不至于发生与世界上其他经济学家在概念上无法沟通的问题。

(三) 小结：静态效率低下引起总供给水平低不属于宏观问题

以上的分析虽然还不能完全说明总供求缺口究竟由什么决定的问题，但至少可以明确一点：生产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合理引起的总供给水平低、增长率低，这一问题不属于宏观经济问题，而属于微观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微观问题与宏观问题当然是相互联系的；但是，在理论分析中，我们必须明确各种理论问题在整个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而不是把不同层次上的各种问题混为一谈。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大纲》中所进行的宏观理论分析，基本上将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的问题抽象掉，在研究总供求关系和经济增长问题时，将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视为一定，从而抽象集中地分析动态效率问题（以及各种动态效率对静态效率的“反作用”）。这样做丝毫不否认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低下问题的存在，而只是由于理论分工而不作为宏观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罢了。

二、潜在总供给与实际总供给

仅说明微观问题与宏观问题的差别，还是不能完全避免混淆；要清晰地把握理论体系的各个环节，还有赖于说明微观问题与宏观问题的联系。我们认为，微观静态效率与宏观动态效率相互联系、相互衔接的“枢纽概念”，就是“经济潜在总供给”的概念。

(一) 技术潜在总供给与经济潜在总供给

一个社会所能生产出来的社会总产品，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两

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资源数量和技术条件；另一方面就是社会经济体制。在现实中，这两方面的因素同时决定着总产出水平。但在理论分析中，我们也可以分别对两方面因素的作用进行抽象分析。在假定一种社会经济体制完全不存在效率低下问题时，我们可以定义那种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技术进行生产而形成的最大限度总产出水平为“技术潜在总供给”，它是单纯从技术方面定义的社会生产能力。但是，世界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任何社会经济制度下都可能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尽管程度不同），因而不可能真的实现或达到物质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可能的总产出水平，效率低下所造成的损失、浪费，事实上构成对现有技术生产能力的一种扣除；效率高些，扣除的少些；效率越低，扣除的越多；而一种特定的效率水平，是由一定时期内特定的社会经济体制决定的——是这种体制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利益摩擦、努力程度、信息完全程度、创新动机大小等等。因此，一个时期内一个社会所实际拥有的社会生产能力，通常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体制所规定的小于技术潜在总供给的一种水平。我们就定义这种受到社会经济制度局限的社会生产能力为“经济潜在总供给”；它是在具体条件下不仅受物质技术条件限制、也受社会经济体制限制的社会生产能力。

（二）经济潜在总供给与实际总供给

从技术潜在总供给中扣除了一定体制下不可避免出现的效率损失，构成了经济潜在总供给；但是，这里所扣除的效率损失，只是由生产无效率和配置无效率所造成的损失，而不包含动态无效率所造成的损失。换言之，“‘经济潜在总供给’概念，可能包含着其他方面的无效率因素，但在动态均衡的意义上，是有效率的”。^④

动态效率问题，体现在“实际总供给”的概念当中。潜在总供

给体现的是社会现有的实际生产能力，若这种生产能力得到了充分利用，实际总供给就会等于潜在总供给，这时经济便是动态有效率的；若这种生产能力未能被充分利用，存在失业或设备的被迫闲置，实际的总供给，就会小于潜在总供给；而若社会生产能力被过度利用，出现设备疲劳使用，资源过度开采，经济增长过热等现象，则实际总供给就可能在短期内超过经济潜在总供给。^⑤ 这后两种情况，都是动态无效率的。换言之，只要实际总供给不等于经济潜在总供给，便是发生了某种动态无效率的情况。

这样，在概念体系中，经济潜在总供给与技术潜在总供给的差别，体现的是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方面的问题；而实际总供给与经济潜在总供给的差别，则体现着动态效率方面所发生的问题。

这样一种概念体系，与西方经济学中的概念体系也是相一致的。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潜在总供给概念也是暗含着动态有效率的：只要实际总供给等于潜在总供给，就实现了充分就业和均衡增长，经济从动态上看就是有效率的；而实际总供给小于或大于潜在总供给，便被认为是不好的、缺乏动态效率的。^⑥

（三）作为宏观理论分析前提的经济潜在总供给

通常人们所说的引起供给水平低下的劳动者不努力、企业管理不善、损失浪费、生产资料滞存(过多储备)、库存积压、粗制滥造、生产结构不合理(配置无效率)等等，事实上都属于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方面的问题，因此不属于宏观理论研究的范围；但是，这些问题都反应在“经济潜在总供给”的水平上，微观效率越低，社会实际生产能力亦即经济潜在总供给水平越低；反之亦然。

我们不能脱离经济潜在总供给水平来分析宏观经济问题，但

是，这并不是说经济潜在总供给水平本身如何决定的问题是宏观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相反，宏观经济分析通常只是把一定的（可以是任意一种）经济潜在总供给水平当作分析的前提，也就是把一定的微观效率当作既定的前提。这不仅是学科分工的需要，而且也是抽象地分析每个理论问题的需要。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一切有关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的问题是在微观理论中加以分析的。在进行宏观分析的时候，人们通常只需用下面这一句话，作为从微观到宏观的联系和过渡：“给定潜在总供给。”这句话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从实践的角度看，在私人市场经济中的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是由私人企业和市场机制自动予以实现的，只要假定上述经济体制存在，就可以假定一种效率水平存在；第二，从理论分析结构的角度看，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问题是由微观理论研究的问题，宏观理论仅研究动态效率问题，因此只要给定经济潜在总供给作为分析的前提就可以了，而无需再对微观效率的问题进行更多的说明。公有制经济理论体系，严格地说也应该具有这样的结构：在微观部分说清有关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各种问题，从而阐明这一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潜在总供给是如何决定的，然后在宏观理论中，就可以抽象而集中地分析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以及实际总供给与潜在总供给的关系。在《大纲》中，我们设了一篇（第3篇）来专门说明经济潜在总供给是如何决定的，这只是因为在在我们看来有些微观效率问题还有待说明，公有制微观理论还有待完善，特别是因为我们想以此来阐明微观效率在说明整个经济运动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以澄清某些容易引起混淆的概念，包括本文想进一步澄清的概念，而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内容本来应该属于宏观理论分析的内容。

(四) 小结：宏观理论所研究的是什么

上一节我们根据问题的差别，初步说明了宏观理论研究的内容；本节我们则试图根据问题的联系，说明宏观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即一个给定的“经济潜在总供给”。这样，在明确了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之后，宏观经济理论究竟研究什么问题似乎进一步明确起来了。

在进行宏观分析之前，我们可以也应该假定有关生产效率与配置效率的基本问题已经由微观分析加以说明了，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被说明的（虽然不是由宏观理论本身说明的）经济潜在总供给，作为宏观分析的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围绕动态效率这一根本问题，宏观理论要完成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任务：

第一，在特定的体制条件下说明总需求的形成过程和总需求与经济潜在总供给的差额，也就是理论上所说的超额总需求或“总供求缺口”（及其各种表现形式，如通货膨胀、被迫储蓄等等）；

第二，进一步研究总供求缺口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它对实际总供给的影响，从而说明实际总供给与潜在总供给发生差异的原因，也就是说明出现动态无效率的原因。当然，进一步我们还可以研究总供求缺口对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影响（宏观问题对微观问题的影响）。

以下两小节，我们便分别对这两个基本方面作些分析，以阐明在这两个方面研究中容易引起争论的一些问题。

三、“东西太少”和“有钱买不到东西” 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现在我们回到本文最初提到的第一个问题：超额总需求或总